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我们绝不接受颐指气使的说教 ——『教师爷』般

□樊吉社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

“教师爷”与教师大不相同。教师的专长是“传道授业解惑”，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中华民族素有尊师重教、崇智尚学的优良传统。“教师爷”则有另一番迥然不同的形象：以德能超人自诩，自信长缨在手、真理在握，擅长指手画脚。“教师爷”的做派不仅常见于普通个体之间的交往，也在冷战结束后的30余年中见诸国际舞台。习近平总书记用“教师爷”比喻那些因经济发展水平比其他国家领先一步，致其自信陡然上升，并萌生为他国指点江山冲动的国家，强调中国在发展同其他国家关系问题上，向来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我们不会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也决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内政。

“教师爷”最大的特点就是盲目自信，国际舞台上的“教师爷”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等多个方面也呈现出这样的特征。例如冷战结束赋予美国巨大的自信，在这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两种模式的阵营较量结束后，美国以“赢家”的姿态傲视世界，自诩为“民主”的象征和代言人。被盲目自信裹挟的美国在冷战结束后试图改造他国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例如克林顿政府将国家安全战略定位为“接触”与“扩展”，即与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进行“接触”，以实现其所谓的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的“扩展”。

正如盲目接受“教师爷”的说教可能会产生诸多问题，国际舞台上的“教师爷”推广民主制度、经济模式和价值理念的行为导致多国国内长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不能想象脱离国情、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对一些国家来说，此种操作必然导致水土不服，不论是政治转型、经济转型还是社会转型，都很难成功。

当前，国际舞台上的“教师爷”时常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干涉中国内政，给中国制造困难。但是，中国抵抗住了外来的压力，在吸收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的同时，拒绝“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适合中国的国情，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经过中国共产党人一百多年的奋斗和探索，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时移世易，冷战结束30余年后，曾对其制度和道路具有高度自信的美国，正面临诸多深刻的国内问题，诸如社会严重撕裂、贫富分化加剧和长期的政治僵局。一个国内重重难题短期内难以化解的美国，现在仍然在其对华政策中侈谈制度、道路以及自由、民主、人权问题，并将其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服务于遏制、围堵、打压中国的目的和干涉中国内政的需要。中美制度和道路的不同并非始于今天，这种区别也不可能在未来消失，各自的制度和道路符合各自的国情。中美关系是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对双方存在的具体分歧，可以进行探讨，前提是平等交流。就此而言，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可以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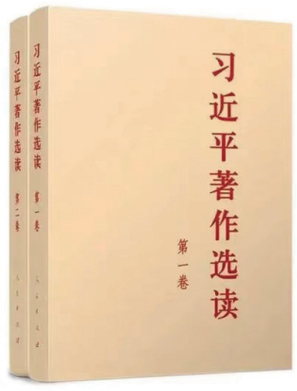
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读习近平总书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

□柳宝军

习近平著作选读

重读经典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讲话的一部分，收录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这篇重要文献深刻分析了古今中外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深刻阐述了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为继续深化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方向，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纲领性文献。深入学习这篇重要文献，对于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坚持问题导向，科学判断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任务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强调，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全面从严治党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我们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从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任务，一方面，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对我们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另一方面，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素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是尖锐的、严峻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两方面的现实决定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把住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特别是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这一重要论述为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

将我们党对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指出：“我们党执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演变的教训，都揭示了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2019年6月24日，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2021年11月11日，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这些重要论述充分彰显出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深刻揭示了我们党能够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内在奥秘。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同封建王朝、农民起义军有着本质区别，不可简单类比，但可以从中深刻洞悉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衰更替的历史经验教训。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不容易”，即“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这“四个不容易”精辟阐明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的“大党之难”。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重大命题，这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那么，我们党应当怎样保持自身始终过硬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这篇重要文献将我们党对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史上，我们党率先提出“党的自我革命”这一重大命题，并在长期实践探索中找到了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无疑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为世界政党治理和政治文明进步贡献自身独有智慧和方案的风范与担当。

对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了“五个过硬”的要求

历史接力是一棒接着一棒向前奔跑的，党和国家事业是一程接着一程向前推进的。着力把我们党建设好，必须抓住党的高级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个过硬”的要求。

第一，信念过硬。坚定理想信念是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力量和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第二，政治过硬。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在领导干部的所有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要在守纪律、讲规矩上作表率，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第三，责任过硬。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第四，能力过硬。要增强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的自觉性和紧迫感，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全面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第五，作风过硬。要成为作风建设的积极践行者，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持之以恒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久久为功祛除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在服务人民中不断完善自己。这“五个过硬”既是对党的高级干部提出的“硬标准”，也是对全体党员干部发出的动员令，为继续深化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方向。



“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

——新闻学家戈公振的治学之道

□邓绍根 强若琳

学人小传

戈公振（1890—1935年）：名绍发，字春霆，江苏东台人。民国时期著名报人、新闻学家、中国新闻史学开拓者。著有《中国报学史》《新闻学》等。

戈公振一生奉献新闻事业，曾先后在《东台日报》《时报》《申报》工作，任校对、助理编辑、编辑、总编辑等职；在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教授新闻课程。中国新闻史学家方汉奇评价其为“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全才”。

苦学为乐，不慕近功

任职《时报》期间，戈公振回故里探亲，送给侄儿戈宝权一盒积木，盒盖内用工整的小楷写着：“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这不仅是戈公振对侄儿的勉励，也是其一生坚守的治学信条。

戈公振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聪敏好学，对读过的书，皆能做到默诵。从6岁起，先后就读于家塾、学塾和多所学校，成绩始终名列前茅。23岁时，碍于经济情况，他将读书机会让给哥哥，只身前往上海闯荡，经引荐进入有正书局图画部做学徒，开启“自学”之路。在书局工作期间，他白天上班，夜间读书，不曾一刻放弃过学习。进入《时报》工作后，他亦常到青年会补习英文。其同事朱应鹏回忆说：“在他的抽斗中，时常可以看见面包和糖果之类，以为他爱吃这些东西，实则他竟是用以代饭的。他自恨对于外国文字的不足，在工作之余，每天必须补习英文几小时，他这种精勤刻励的精神，真正可以佩服的。”之后，戈公振赴欧美、日本、苏联等地参观访问各国新闻业时，又自学了法语、德语、日语、俄语等，都能达到可交流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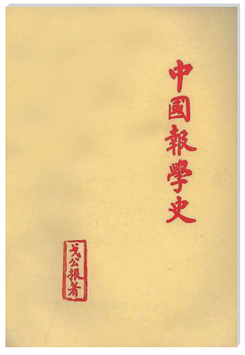
戈公振勤恳刻苦不仅在求学，更贯穿于治学。为了写作《中国报学史》，他不仅常驻于徐家汇的图书馆和藏书楼查阅文献，还广泛求教于蒋光慈等专家学者，并力图“访求旧报”以考证细节。据其侄戈宝权回忆：“我记得在他的书房（同时也是他的卧室）里，有四个高大的书架，全放满了有关新闻学的书籍和收藏着各种稀有的报刊与剪报。”他治学“求真”，在《中国报学史》出版后仍继续从事修订工作。无论何时何地，皆随身携带一本“用深蓝色的丝绸装订成”的书稿，即时勘误、补充新材料。如访英期间，他看到“曩日遍访而未得之定期出版物多种”后，即写《英京读书记》以作为“外报”部分的补正。戈公振在《申报》资料部工作期间，文卷繁杂且不受重视，他却自得其乐，“有功无功在人，肯劳不肯劳在我，只要我肯劳，就不管有功无功了”。话语间尽显其苦学为乐、不慕近功之精神。

长于思考，敢于拓荒

自1916年正式踏足新闻业，戈公振驻足其间二十载，不仅作为一名全能型新闻工作者，更是一位优秀学者。

一方面，戈公振开创性将欧美“新闻学”译作“报学”，并确立了“报学史”研究是一门学问。其所著《中国报学史》全面而系统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程，被誉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对后世影响深远。另一方面，锚定了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内容与范式。对于何为报学史，戈公振提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明确了报学史的研究路径、研究对象与考察范围。

戈公振还将治史传统与新闻学相结合，“力求以史料勾勒一事一物的原貌”，考证搜集大量一手资料，为后世研究者打下基础。成书后的《中国报学史》，附载图片达150余幅，既有“殷之刻骨”“周之刻金”，也有《宫门钞》《京报》等材料。戈公振还借外文著作广泛了解世界新闻业与新闻学研究，该书《报纸之定义》一节，字数不过万字却参考英文、法文、德文等书目10余种，前瞻性地为“中国的问题”提供了“世界眼光”。



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封面

此外，戈公振任职于报社期间，不仅从事采编等业务工作，还在大夏大学、复旦大学讲授报学史课程、组织报学社和讲习班，更专门赴欧美、日本各国实地考察新闻业，力求将学术研究与业务工作、教学相结合，以互相促进。

为报国而治学

戈公振生活的时代，可谓近代中国史上的“多事之秋”，社会动荡与矛盾林立。在这样的时局下，“为报国而治学”无疑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坚定选择。戈公振的治学思想与实践也呈现出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

在多年新闻实践中，戈公振意识到当时我国新闻界人才短缺、职业意识淡薄，急需开展研究工作以规范新闻业。在其第一本译著《新闻学撮要》中，他就将“治书”与我国新闻界之良性发展相连。他认为新闻学与社会各学问都有关联，记者当把事实与学问、读书与做事结合起来，不可偏废。他在书中写道：“万一多少有贡献于中国新闻界，那就是编者的莫大希望。”

《中国报学史》则进一步揭露了外报侵华活动，谴责了封建军阀对报业的压制政策，赞扬了一批革命进步报刊，鲜明展现出他的爱国主义立场。如对于一些反动的在华外报，他揭露其“为侵略鼓噪”的本质：“及经几度战事，窘象毕露，言论乃肆无忌惮。挑衅饰非，淆乱听闻，无恶不作矣。”对于日办报纸的罪行，他更是直言：“斯可忍，孰不可忍！附述于此，以当国人棒喝。”他对民国以来报纸革命精神衰退、耽溺商娱的状况深感忧虑，称报纸“渐失指导舆论之精神”。他还将报纸视作“人类维持生命之血”，主张报纸应代表民意；报人则应“对于公众及国家负责任”，讲求国家利益和团体意识高于个人利益。在《中国报学史》的自序中，戈公振更是直言其治书之目的：“念光复之艰难，懔栋析榱崩之惧，操笔前驱，吾报界实责无旁贷。”寥寥数句，其爱国报国之心，可见一斑。

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战争后，戈公振的思想进一步转变，他不仅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无论是任职中国著作家抗日会、筹备抗日舆论报刊还是赴东北、苏联考察，戈公振始终秉持“只有尽国民一份子责任，从自己奋斗起”的爱国信念。1935年，他应邹韬奋之邀回国筹办《生活日报》，因旅途劳顿和疾病缠身，于该年11月不治身亡。弥留之际，戈公振说道：“在俄国有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回来，但是国事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我是中国人”这五个字也成为戈公振去世前的最终回响。

诚如方汉奇所言：“他只活了45年，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却是光辉夺目十分辉煌的。”踏足新闻事业的二十载间，戈公振集名记者、学者于一身，其勤学不辍、严谨求真、一心报国的治学态度也留给后世启迪。

